



The Presentation of Urban Spatial Spiritual Ecology and Aesthetic Discourse in the Gaze of Modernity

Deng Zhi-wen*, Guo Y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China

Email address:

cary208@126.com (Deng Zhi-wen)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Deng Zhi-wen, Guo Yu. The Presentation of Urban Spatial Spiritual Ecology and Aesthetic Discourse in the Gaze of Modernity.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2, No. 6, 2023, pp. 250-258. doi: 10.11648/j.si.20231106.15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3; **Accepted:** November 15, 2023; **Published:** November 21, 2023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modernity engineering has promoted the urb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practice of the main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iscourse hegemony of capitalist spatial production, the scene of spatial imbalance ha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blems with the spiritual ecology of the subjec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space, and ecology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Examining the issue of the spiritual ecology of the subject, the poetic dwelling of the subject in urban space, the poetic experience of modern art aesthetics, and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alternative spaces present a sense of "self redemption of modernity", reflecting on the expanding rationality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esthetic modernity. Art and aesthetics can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deep ecological goals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place feeling" and "home feel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of spatial aesthetics,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whole life" mode of spatial experience into ecological practice, thus constructing a holistic ecological landscape that integrates aesthetics and ecology, nature and city, and spirit and material.

Keywords: Urban Space, Spiritual Ecology, "Sense of Place", "Whole Life" Model, Modernity

现代性凝视中的城市空间精神生态及美学话语呈现

邓志文*, 郭彧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咸宁, 中国

邮箱

cary208@126.com (邓志文)

摘要: 现代性工程一方面推动了空间的城市化重构, 推动主体空间实践的不断深入;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话语霸权带来空间失衡的场景, 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主体精神生态的问题。主体、空间与生态三者建构出相互影响的辩证关联,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主体精神生态的问题, 主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诗意栖居、现代艺术审美的诗性体验以及另类空间的文化批判等呈现出“现代性的自我救赎”意味, 对启蒙现代性的膨胀理性进行反思, 并融合成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与审美可以有效介入城市空间的生态建设, 通过“场所感”“家园感”的认同、空间审美的交往对话推动深层生态学目标的实现以及空间体验的“整生”模式渗透生态实践, 从而建构审美与生态、自然与城市、精神与物质相互融合的整体化生态景观。

关键词：城市空间，精神生态，“场所感”，“整生”模式，现代性

1. 前言

城市空间的建构与变革是人类社会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出主体的物质实践能力与空间生产话语，成为影响到主体审美体验、生态意识、实践生存以及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现代城市的景观规划、高层建筑的密集设计、空间区域的功能划分、街道交通的网络结构等等，这些都表征出现代性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与主体理性实践能力的提升，也带来了主体新一轮的文化、审美以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变革。由此，现代性内部就产生了“自反性”的分裂，呈现出工业理性与感性精神相对立、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相交融的景观。现代主义艺术倡导的感性救赎与审美自律原则成为激进的对抗话语，从而实现主体自由完满的生存体验。本雅明塑造的“闲逛者”形象、马尔库塞对“单面人”的审美批判、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都试图在工业理性的“总体化”规训中找寻艺术与审美的自由价值。审美的情趣与优雅、主体的流动与自由、自然的静谧与生机不仅内蕴审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更是成为主体精神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出主体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审美景观。从而，城市空间的建构被纳入现代性工程的宏大语境之中，延展出一条从物质空间到精神空间、从空间实践到空间审美的理论线索。伴随城市空间的确立与转型，生态问题也成为“空间异化”的结果。资本流动、城市膨胀、积累危机、空间区隔等资本主义话语霸权不仅引发了空间异化的景观，也导致城市出现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与主体精神生态问题，成为启蒙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艺术、审美与感性作为“自反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一方面以审美救赎的姿态激烈对抗资产积极理性霸权，试图恢复主体的“新感性”来反思工业文明的话语，比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诸多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借助艺术表达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成为主体精神生态的组成部分，恢复主体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诗性感知，实现主体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存的目标。精神生态成为审美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并适应了后现代知识互涉、主体交往的文化景观，推动建构生态美学的话语体系。可见，城市空间、精神生态与审美现代性构成了相互交融的理论关联，形成了空间、审美与生态的“三元辩证法”，从而给现代主体的审美自由与生态自然提供了理论启示。

2. 空间异化：现代性工程与精神生态话语的出场

现代工业城市的确立是现代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主体空间实践能力的提升和空间元素的社会化塑造。如果说传统空间是建立在主体与自然大地客观存在基础上的三维量化形式，具有明显的客观物质属性；那么现代性工程和工业化大生产则推动了主体空间实践的进程，

促使空间呈现出实践性与社会性的面貌。空间已经成为确证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产品，表征出主体改造自然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进程。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系统展开了涉及空间实践的城市、生态、环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反思。

2.1. 空间实践与现代性空间失衡景观

首先，现代空间构成主体进行社会化生产实践的基础。空间不仅仅是具有自然属性的本体存在，更是直接纳入主体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制造产品和文化实践的社会化进程内部，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构建元素。“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1]空间给现代工业生产提供了集聚化的“场所”，并且根据生产、交换、消费等不同功能形成一系列的空间结构，推动主体进行高效率的社会化生产。与此同时，现代主体与市场的流动塑造了崭新的交往式空间形态，形成主体化、流动性的空间运作机制，这与传统静止稳定的空间模式产生明显差别。资本和商品的全球化流动、社会大生产的职业分工、交通运输工具的空间连接等等，都表征出从自然空间到现代社会空间的转型。空间实践与空间流动推动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并推动主体生产关系的变革。“收费公路、运河、铁路、汽船和电报、无线电和汽车、集装化运输、喷气飞机运输、电视和远程通讯等等，已经改变了时空关系，并促成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2]可见，空间的主体化与社会化改造表征出现代性工程在空间维度的拓展，也塑造了现代城市空间的面貌。

第二，主体空间实践推动现代工业城市的形成。传统城市建立在主体与土地之间“诗性栖居”的基础之上，呈现出场所稳定性与空间和谐性特质。现代工业生产促使诸多主体离开了特定的静穆空间，改变了传统以农耕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将主体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关联转变成成为理性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空间“脱域”形态。一方面，主体摆脱了古典空间的权力依附关系，借助工业理性实现空间流动的自由；另一方面，主体也被纳入社会化生产的宏大语境之中，重构承载聚集生产的城市空间。现代交通工具实现主体、商品与市场等元素交流的便捷，传统稳定的地方生产实践让位于全球化空间的建构，“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3]工业大生产刺激了资本与商品的快速流通，以达到加快周转速度的目的，从而实现利润的增加与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设施、机器厂房、商业市场、技术创造等等，这些推动生产的要素都成为现代城市空间重构的驱动力；资本和劳动者纷纷聚集在城市空间之中，塑造了现代城市多元化、理性化和逻辑化的空间面貌。伴随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现代城市逐步作为区域性生产、交换、技术与生活的中心空间，成为主体空间实践的重要形式。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的空间构造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真实与想象、物质与精神等相交融的场景，有效

持续推动现代性工程不断深入;而工业生产与技术革新也丰富了主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4]城市不仅构成主体空间实践的结果,也通过“空间压缩”“空间交往”等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的进程,促使空间形式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景观。

伴随主体空间实践能力的提升与现代城市的出现,新一轮的空间失衡状况开始出现,并以此导致城市生态环境、主体精神生态以及工业理性霸权等问题,这也正是“现代性之隐忧”的重要表征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空间正义”的文化批判策略,系统对资产阶级的空间话语霸权进行反思,希望实现包括主体生活空间在内的自由与解放。现代化大生产不仅塑造了社会化与“人化”的空间面貌,更是蕴含了资产阶级空间霸权不断展开的进程。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正是资本、商品和原料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进程,凸显了空间元素的经济地理学意蕴。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积累与商品流通,重构了全球地理空间的面貌,形成了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在该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空间改造进行了辩证化的反思。现代空间实践促使主体摆脱了传统空间的权力依附性关系,但是却被纳入到雇佣劳动与生产剥削的空间“异化”维度,显示出空间分配的失衡场景。城市与乡村、自然与荒野、商业区与贫民区等等之间充满了空间对立关系,而劳动的“异化”再次加剧了不同空间的矛盾与对抗。无产阶级工人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异化存在,不仅要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也失去了空间实践的主动性与自由性。这都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新一轮的空间压迫场景。“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5]

现代城市的建立虽然消泯了传统空间的地理局限性,但是通过主体交往与职业分工促使更多人集中在特定空间,都被纳入资本运行的宏大场域之中。而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主体所占据的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并受到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规训。资产阶级借助资本力量获得空间支配的优先权利,往往占据更加具有优势的生产与生活的资源;而将环境压力大、生产污染严重的相关产业集中在落后边缘地区,造成空间生态的严重失衡。由此,远离核心城市的自然空间、落后地区等就越来越面临生态破坏的压力。与此同时,资本通过地租的形式重塑城市的空间区域,无产阶级和大众平民局限在城市边缘空间,生态环境极为恶劣。这不仅由于工业生产的“异化”行为造成,更是源自阶级对立所造成的空间失衡。工人聚居区往往环境设施条件较差,生态问题也较为明显,并且与城市中心空间保持距离。城市生态空间的异化与工人生存空间的异化形成密切关联,一方面,资本主义大生产与占据空间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剩余价值,这就带来空间空间的失衡场景,引发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空间的分化、区隔与不平衡也带来生态治理的混乱,凸显了空间元素在生态问题中的重要性。“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

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象的。[6]可见,资产阶级通过资本造成空间的“割裂”与“冲突”,并产生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空间异化的场景表征出现代性发展的内在之“隐忧”,揭示了城市生态的社会属性,并涉及主体交往、贫富分化、市场伦理等一系列知识场域。

2.2. 城市精神生态问题的生成

现代性工程一方面推动了空间的城市化重构,推动主体空间实践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话语霸权带来空间失衡的场景,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主体精神生态的问题。由此,主体、空间与生态三者建构出相互影响的辩证关联,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的空间霸权、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差异性、空间分配的不均衡、空间权力的非正义性等等,此种空间异化的社会化生产与自然和谐的自然生态景观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二元对抗”关系,造成城市生态问题的逐步恶化。

从城市自然生态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出现的异化场景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生态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要求社会化大生产不断追求剩余价值与利润,实现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目的。由此,工业大生产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与理性逻辑话语成为主导,工人阶级、自然空间、环境资源等都成为对象化“工具”,失去了在主体交往基础上的存在价值。在经济效益第一位的前提下,生态系统与自然环境的内在发展规律被忽视,经济利益价值超越了环境保护行为,从而导致空气污染、污水排放、过度开发、资源枯竭、植被破坏、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与此同时,城市空间关系的失衡造成先进的技术、资本和良好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商业中心区;而城市边缘空间和落后地区则承担着更为严重的生态压力。生态危机已经被资产阶级悄然转移到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群体,借助空间异化达到生态异化的目的。可见,城市生态问题的出现不仅仅体现了现代性工程的自然异化场景,也表征出社会关系与阶级差异的问题。“社会关系矛盾必然会使土地承担社会矛盾,并且使之内化到生态系统工程自身之中。[7]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了对特定空间区域与自然资源的开发控制,客观上形成了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违背了自然生态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统一性规律,造成城市空间治理的困难。由此,空间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寻求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路径,另类空间的差异性、精神生态的体验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等都可以成为生态保护的组成部分。

从城市精神生态的角度而言,城市空间的异化场景导致主体精神生态的失衡与空间审美体验的式微。伴随城市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城市主体的身体与精神生态也面临“空间压缩”的紧张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主体在对世界进行改造和物质实践的时候,与自然建立起相互融合、和谐发展的自由关联。一方面,主体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自然界整体发展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自然界也面向主体的实践而展开,成为主体活动的“身体存在”。因此,主体与自然界之间应该建立起和谐共存的自由景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

的《自然辩证法》等文献突出了主体面向自然的“感觉的丰富性”，突出主体的生态本源性与自然的平衡规律性。主体在自然中进行劳动实践，并与自然形成了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的密切关联，自然给主体提供了生活实践的物质资源，也塑造了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审美愉悦感，凸显精神实践的价值功能。所以，“人的本质”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二者形成了“生生与共”的整体性关联。“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可见，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且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和谐共存中实现主体劳动实践的自由。而资本主义的异化生产、资本驱动与空间霸权则消解了主体面向自然进行自由实践的愉悦感，带来城市空间的压迫感、漂泊感与紧张感。城市内部的空间区隔、生态资源的分配失衡、工业理性的资本压迫等等，这些都割裂了普通主体与自然空间之间的诗性情感体验，也悬置了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愉悦，而将城市空间异化成为资产阶级话语规训的场所。“城市的意义开始逆转：不仅所有的城市都从生产性空间转变为消费性空间，而且城市空间成为消费的对象从而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9]城市空间逐步消泯了主体面对历史遗迹、文化场所、民俗风情以及家园认同的精神体验，而是逐步将资本运作与市场伦理视为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成为“逐利而动”的空间符号。与此同时，伴随后现代工业生产“灵活积累”等模式的生成，资本、商品的流通更加便捷；物质生产的方式与技术更加多元，“同质性”的文化产业迅速渗透到主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给主体带来全新的“空间压缩”体验，显示出空间能指符号的流动与漂移，造成了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10]在城市空间的分化与同质性空间压缩语境中，主体如同进入到令人迷惑的“超空间”场景内部[11]，不仅无法给自身进行准确的空间定位，恢复清晰的审美认知能力，也割裂了主体与自然之间诗性的精神生态关联，陷入异化的市场消费伦理之中。这也正是城市空间异化所造成的主体存在困境。

3. 诗性伦理：城市空间审美体验与主体精神生态建构

现代城市的生态问题与主体精神生态失衡状况是现代性工程之“隐忧”的体现，并在城市空间异化的场景中进一步加剧。如果要克服城市主体精神生态的危机，推动生态正义的现实实践，就需要立足于主体的身份认同、感性认知与审美理念，恢复主体与自然空间的诗性关联，实现主体内在身体与精神生态的完善。因此，主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诗意栖居、现代艺术审美的文化批判以及另类空间的精神生态建构等都呈现出“现代性的自我救赎”意味，对启蒙现代性的膨胀理性进行反思，并融合成为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了主体的感性力量与“美的规律”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本体作用，并能够推动主体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存在自由。主体在面向自然的劳动实践中，

逐步提升了自身的审美意识，形成了能够感受自然之美的视知觉身体感受能力。由此，主体就不再仅仅是以物质实践的方式来改造自然，而是以“美的规律”话语将自然作为感性、形象和情感的对象化存在，推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命自由体验。“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2]主体感性审美力量构成主体内在精神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主体重新审视物质实践活动，实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完美融合。与此同时，审美感性也并非仅仅着眼于主体自身的生态意识，而是通过空间符号、空间形象等方式成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承载，内蕴文化批判的意味。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学科互涉与文化研究的路径将生态审美纳入城市空间、文化产业、影像传媒以及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凸显审美精神话语与文本审美符号的差异性、革命性特质。本雅明、戴维·哈维、詹姆逊、威廉斯、鲍曼等学者将主体精神生态问题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阐释，展现审美意识、精神生态、城市空间与文化景观之间的知识关联。空间元素与空间符号不仅仅内蕴了主体“美的规律”的诗性审美体验，凸显具有艺术想象特质的情感凝聚话语；更是表征出深层次的社会实践、历史文化与主体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亦带来了象征空间的组织化（纪念碑、圣地、围墙、大门、房屋的内部空间）和符号体系的空间控制。”[13]由此，主体感性审美完成了从“内在”主体精神生态自由，到“外在”生态文化反思批判的完整理论线索，形成了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审美救赎话语。

3.1. 城市空间的审美文化反思构成精神生态建构的首要维度

如果说城市空间异化与生态异化是启蒙现代性工程的内在隐忧，是资本霸权和工业理性不断膨胀的结果，并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那么以审美感性和现代主义文艺重构审美救赎理念，推动文化批判就成为恢复主体精神生态自由的基础。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与城市空间的区隔造成主体与自然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城市不同空间之间的“疏离”与隔膜，便捷的信息交通技术却带来新一轮的“空间压缩”感觉；影像的单向度传播与“内爆”使传统深度感的审美体验走向平面化感知，促使主体的视知觉沉浸在城市“超空间”的能指符号漂移之中。诸如鲍曼所认为的“私化空间”模式逐步形成，并日益占据重要维度。私化空间不仅取代公共空间的文化反思功能，而且建构出更加零散化、碎微化的主体生存场景，造成生态环境资源分配的“非正义性”与激烈竞争，从而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建设的整体方案也被逐步消解。“不是和睦相处，而是躲避与隔离，已成了当代大都市中主要的生存策略。”[14]私化空间可以视为资产阶级空间和生态霸权在现代城市中的表征呈现，弱化了主体与生态环境的情感体验，加剧了主体的疏离感与孤独感。在此语境中，以审美感性来重新恢复主体空间生存的自由，并进行“外在”的文化反思批判就显得非常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学者本雅明就通过笔下的“闲逛者”形象建构出特定的城市空间美学，并以审美“旁观者”的形

象体验城市空间之美。城市中的闲逛者形象源自现代主义诗人波德莱尔, 主要指涉在巴黎塞纳河岸、拱廊街、城市公园等空间中进行无目的行走的人。他们与资产阶级营造的“拜物教”社会保持一定距离, 以艺术和审美的眼光来审视五光十色的城市空间, 体现出对市场伦理和生产异化的反思态度。闲逛者进行城市空间体验的过程, 也正是重新连续传统城市传统、历史、风俗、自然与城市生态的进程。古建筑蕴含的因地制宜生态理念、特定场所的文化传统体验、拱廊街的艺术审美反思以及主体清晰的空间审美认知, 这些都能够有效对抗时空“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反思资产阶级的空间话语霸权, 从而给城市生态赋予一层温情脉脉的情感观照。闲逛者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 并在城市空间的诗意感受中重塑主体与自然的联系, 试图借助艺术的“光晕”通达精神生态的自由。“我们在接受大自然如此丰富的恩赐时, 应当谨防一种贪得无厌的态势, 因为我们无法回馈给大地母亲任何东西。[15]游逛者身上体现出清晰的审美感性解放话语, 以个体审美体验视角表达对城市空间与生态异化的否定, 并借助艺术“灵韵”、空间审美、符号想象等方式建构起包括城市生态在内的“天人合一”景观, 以主体的诗性伦理完成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批判。“它使人们趋于一种紧密的凝聚力, 而同时又保持着现存的差异性。[16]主体面对城市空间的感性审美话语一方面将生态问题延续到精神生态、生态美学等理论层面, 形成了以艺术审美为重要元素的生态正义与救赎策略; 另一方面也将自然生态与城市空间、艺术自律、现代性思潮进行联系, 拓展了生态文化反思的理论空间。

3.2. 城市空间的诗性体验构成精神生态建构的重要载体

正如上文分析, 资产阶级的生产异化与空间异化带来了启蒙现代性的一系列生态问题, 也造成城市主体的精神生态失衡。从城市边缘生态环境的恶劣, 到生态权利分配的失衡; 从城市内容空间的阶级划分, 到主体内心生存体验的紧张; 从工业理性对和谐自然景观的破坏, 到市场伦理对审美感性场域的压抑, 等等, 这些生态危机都内化于主体精神空间, 导致精神生态的失衡。由此, 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人和自然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17]话语, 拓展了艺术与审美自律的文化视野, 将主体的感性审美体验视为精神生态完善的重要载体。本雅明试图在现代城市语境中重塑主体在前现代时期与自然大地之间的诗性情感共鸣, 以找寻现代主体生存的“精神家园”。主体应当摆脱资产阶级商品利益与政治霸权的规训, 也适当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距离, 重新找寻艺术本真的“光晕”与城市空间的自然生态之美。城市郊区的田园风光、巴黎街道的熙熙攘攘、拱廊街的光影梦幻、河流广场的艺术描绘等等, 这些城市景观都能够激发主体的审美愉悦感, 实现在拱廊街空间中闲逛的精神自由。闲逛者与现代主义艺术在反思工业文明异化的语境中, 再次衔接了主体诗性体验、精神生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 以审美感性的力量重塑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的“单面人”生存状态。精神生态的文化价值逐步得到凸显。“现代人所犯的一个令人不安的错误是: 将这种体验视为无足轻重、可以抛弃的

东西, 并且将它当做是繁星点点的夜空所引发的个人幻想而已。[18]本雅明试图通过对现代艺术的阐释和审美感性的拓展, 重构主体与城市生态之间的想象性、情感性与认同性关联。童年的幸福回忆、工人的畅所欲言、城市的历史传说、艺术的本真体验都构成对现代性异化景观的对抗, 也是进行主体精神生态救赎的关键策略。

与此同时,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视野重构后现代美学的知识形态, 凸显了主体感性审美能力的本体价值。阿多诺将辩证思维纳入艺术美的阐释范畴, 认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主体精神与生命的自由。自然之美正是主体审美的最高阶段, 也是艺术美发展的较高目标, 凝练出主体面对自然进行感性审美的自由“境界”。阿多诺对自然美的肯定也正凸显了唯物主义的优越性, 强调了自然美的本源价值。“审美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含蓄地以唯物主义方式强调客体先于主体的优越性。[19]由此, 主体对城市的感性审美体验重塑了城市空间的“整体性”“栖居性”与“存在感”, 实现了诸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整体化生态世界观, 以审美现象学弥合城市空间的分裂与失衡, 最终建构主体与生态融合、技术与艺术共生生态自由。

3.3. 城市另类空间的审美批判构成精神生态建构的特定形式

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流通与空间异化形成了城市内部各个区域之间、城市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由于资本运行与工业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 这促使城市空间内部出现严重的空间区隔, 商业区、工业生产区、资产阶级富人居住区、城市中心广场等等, 这些空间往往占据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生态资源; 而城市边缘的贫民区、艺术区、乡村、荒野等处则在“被边缘化”的位置, 表征出资本权力影响下的空间失衡景观。空间的区隔不仅导致整体化生态意识的断裂, 也造成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与精神生态的问题。因而, 审美“另类空间”的文化反思就成后现代精神生态建构的形式策略。

福柯将空间视为各种权力交织的文化表征形式, 试图找寻空间中隐匿的知识、权力与话语, 将“另类空间”视为具有独特反抗与解放力量的“异托邦”存在。比如镜像、剧院、舞台、花园、博物馆、咖啡馆、大海等等, 这些空间暂时资产阶级规训的权力空间保持一定距离, 并内蕴独特的传统、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 形成了相互交织且共时性发展的“异托邦”之网。在福柯的笔下, 另类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审美性、生态性与艺术性特质, 具有清晰的空间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 异托邦是充满艺术审美意蕴与自由生存体验的特定地方, 与资产阶级总体化空间保持距离, 成为普通民众进行文化批判的载体; 另一方面, 异托邦也是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场域, 可以将不同的地方重新联系起来, 成为融合真实与想象、物质与审美的特定场域。“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正是这样, 在长方形的舞台上, 剧场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地点连接起来。[20]可见, 另类空间是一种异质与多元、想象与实存、边缘与开放相结合的场域, 充满了解放的力量。比如镜像中的虚拟空间构成主体观审的想象性认同、花园中的空间构成独立于城

市的生态世界、博物馆构成凝聚历史时间的场所体验,等等。这些都游离于空间权力规训之外,塑造不同空间开放交流的后现代景观。福柯的另类空间理论确证了边缘空间、碎微空间和异质空间的重要性,也凸显出空间想象、精神空间、审美空间在整个现代性进程中的作用,也给城市精神生态建设提供了契机。

城市景观的自然静谧、郊区农田的生机盎然、文化场所的历史感怀、建筑设计的因地制宜,都可以视为融合了真实与想象、生态与审美的另类空间模式。这些不仅建构了整体化的城市生态景观,也有效激发了主体内在的精神审美愉悦,实现主体在城市空间中栖居的自由。城市中另类生态空间的不断丰富与相互联系,就能够形成更为宏观的生态“异托邦”景观,推进城市自然生态与主体精神生态的完善。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城市生态论、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美学、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刘易斯·芒福德的“有机城市”观念等等,都强调了另类空间、异质空间的自然审美意识,给曾被边缘化的空间生态提供了重构与交流的契机。

4. 文化实践: 深层生态学与“整生”意识的美学显现

主体审美感性成为弥合城市精神生态失衡的策略,城市空间成为内蕴特定的情感共鸣与文化符号意蕴。艺术与审美可以有效介入城市空间的生态建设,通过另类空间的场所认同、空间审美的交往对话以及空间体验的“整生”模式渗透生态实践,从而建构审美与生态、自然与城市、精神与物质相互融合的整体化生态景观。这也契合了生态美学的理论目标与价值,拓展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文化反思的美学使命。“生态美学是一种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只有从生态现象学与生态存在论哲学的崭新视角才能理解生态美学。”[21]可见,生态美学不仅以现象学“意向性”交流的方式弥合“二元论”哲学观,凸显了生态问题的美学关照,建构出“整生”论意义上的宏观生态理念;更是也有机融合了城市空间、主体身体、审美知觉、艺术栖居、生命自由等诸多元素,体现出主体存在论视野中的精神自由。生态美学一方面融合了认识论美学、主体论美学的理论资源,以存在论视野建构后现代主体的诗意栖居景观,推动整体化的“生生美学”话语的塑造;另一方面,生态美学也给精神生态的自由与深层生态学提供了理论资源,成为反思启蒙现代性的重要策略。如果说城市生态问题源自现代性工程空间实践的异化状况,那么生态存在论意义上的美学救赎则成为弥补现代性弊端的方式。从该视角出发,城市的精神生态建设需要更加关注空间、生态、主体和美学四维元素之间的融合关系,建构一条从自然生态完善、精神生态丰富,再到生命审美自由的理论线索。“‘存在’,充满着无法追忆的空间记忆,超越了‘形成’。……空间意象于是就对历史表明了一种重要的力量。”[22]

4.1. 城市另类空间建构起主体的“场所感”“家园感”

作为曾被现代工业文明与技术理想所边缘化的另类空间,往往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自然美感和天人合一的生态

意识,并在特定空间场所进行体验、传达与表现,推动生态审美的拓展与生态正义的实现。比如城市边缘的森林、农田、河流、古镇、村落、建筑以及城市空间内部的港口、水坝、花园、小径等,这些“微空间”场域与工业生产空间、商业空间保持一定距离,也远离了资本逻辑的市场同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特质。但这些领域恰恰是自然面向主体进行“生成”和“敞开”的地方,体现出主体与自然界的“意向性”融合,是主体实践与自然生态进行动态“化合”之境。一方面,城市中的特定空间并非如同荒野、山峦、沙漠等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领域,而是经过主体实践并且呈现“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空间场所,表征出自然面向主体的敞开;另一方面,这些景观也作为主体的审美对象而存在,凝聚着主体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情感愉悦,通过“自然的人化”建构审美现象界的自由。生态之美就超越了机械反映论的二元论话语,成为融合自然与人文、生态与技术的生命存在。“价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23]城市空间生态之美正是在主体与自然环境的情感意义共鸣与主体参与性的前提中展开,是一种追求自然本“真”、生命之“善”与形式之“美”的综合性话语。

爱德华·索亚通过对城市“第三空间”的描绘,找寻另类城市空间中的建筑、传统、文化、主体精神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探究无产阶级对抗资产积极的生态正义方案。索亚将阿姆斯特丹与超级工业城市洛杉矶进行比较,凸显另类城市阿姆斯特丹的生态空间格局与生态正义实践。如果说洛杉矶城市空间体现出典型的现代工业城市形态,展现经济、生态、阶级等领域的二元分化场景;那么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空间布局则体现出强烈的“自反性现代化”意味,不仅城市中心的居住人口较少,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也被限制使用,水坝、运河、花园、古建筑、咖啡馆、博物馆等如“星丛”般散落在城市中心空间,呈现出自然生态的设计理念与宽松平和的空间氛围,并与工业现代性保持距离。旅游、文化和教育成为城市重要的经济形式,与城市的生态建设构成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作用。索亚曾经在阿姆斯特丹居住过一段时间,深切体验到城市空间作为融合历史、传统、生态、人文与审美等综合场域的文化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与其他现代工业都市相比,阿姆斯特丹城市空间充满了自然的静谧与艺术的气息,历史的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自然的生机得以融合,主体能够以身体视知觉感知的方式介入其中,形成身体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意向性”交流。“我以斯坝伊街上及其附近的生活印象,一方面来包裹我们那些去向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方面又来重新打开它们。斯坝伊街是阿姆斯特丹我的家园所在。”[24]“重新打开它们”正是以主体审美话语彰显另类空间的生态正义力量。与此同时,主体与另类空间的精神生态共鸣也建构出了城市空间的“场所感”“地方感”,重建面对自然、环境、传统与地理的身份认同意识,衔接了自然与历史、审美与传统,建构在城市空间中的“诗意栖居”。由此,主体的精神生态与诗性体验就具有了审美现代性救赎的文化价值。特定的空间审美、符号共鸣、家园感知与文化认同成为反思城市启蒙现代性的关键策略,也推动实现主体的精神自由。“只有该单元

有强烈的地方风情、视觉特征和清晰的边界时,这种洞察才会变得生动真实。[25]从段义孚对空间经验“地方感”的认知体验,到诺伯舒兹对建筑现象学“场所感”的归纳,都凸显了主体精神生态在城市中的实践,并涉及文化旅游、生态开发、建筑设计、公共艺术等一系列领域。

4.2. 城市空间体验推动“深层生态学”目标的实现

城市空间审美体验与生态审美意识的确立也呼应了“深层生态学”的理论目标与话语内涵,并将生态学的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等社会实践拓展到主体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审美体验维度,实现中国古典美学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天地大美”的天籁“生生”之境。天地四时的流转、万物自然生长的“成理”以及主体内在心灵的精诚贵真等等,这些都凸显了主体外在的自然实践、内在的精神气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关系,也正是此种精神层面的呼应与共鸣,最终实现了终极的生命自由,达到庄子所认为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26]境界。此种关于生命运行规律与生态自由的审美体验,也正是生态美学所彰显的理论价值,是一种倡导“整体论”“深层生态学”的话语形态。与其他美学知识形态不同,生态美学实现了美学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美学“天人合一”“生生为易”“道法自然”等话语范畴,建构主体与自然的“整生”融合关联,也借鉴了现代“存在论”知识资源,以“诗意地栖居”与“天地人神四方游戏”塑造了诸多生命平等共存的有机整体观,推动工具论与存在论、主体论与客体论、审美论与生态论的统一。“这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意味着一个旧的美学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美学时代的开始。[27]

许多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学者往往凸显主体面向自然、环境、景观和生态的审美感受,强调自然环境的艺术美感与文学艺术之中的自然描绘,以此来反思现代性工程的理性隐忧。生态批评家罗伯特·克恩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凸显文本中“地方自然物”“环境描写”“自然景物”等话语的功用,建构文本、自然与读者之间的“意向性”意义关联。当代生态作家菲利普·布斯的生态诗歌则通过樱桃园、麋鹿、海洋、苍鹭、白杨等意象凸显自然本体的生命之美,借助主体“移情”的方式呈现大地自然的“澄明”之美。“因为生态学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存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等——它是自我包含的——它就是一种深层的审美研究。[28]而城市作为现代性主体空间实践的结果,则可以在若干复杂的系统与层次之中展开生态审美体验进程,推进精神生态等深层生态学的知识拓展。比如城市空间包括建筑、居住、自然、地方、社会等诸多元素,并表征出主体与城市生态空间的“视知觉”体验,能够借助城市建筑、文化遗迹、艺术符号、空间创意等持续推进生态审美体验,实现主体精神生态自由的目的。从“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杭州之美,到“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的福州之境,都彰显了城市生态空间中的审美体验。

事实上,城市建筑与空间本身也构成生态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深化主体对自然的诗性感知;而人工技术制品也成为自然面向主体“澄明”与“敞开”的重要符号中介。海德格尔笔下的“桥”正是一种联系“天地神人”四方整

体的精神生态“聚集”,因为占据了特定的位置空间,将主体纳入到生态环境之中,并进一步激发了主体与河流、河岸等自然景观的诗性情感体验,达到艺术与生态自然的“真理”。特定的地方空间不仅汇聚了自然生态的物质属性,构成主体生活生存的基础;更是成为主体的家园感、位置感、场所感等身体空间“澄明”的城所,成为主体空间知觉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契机。“桥把大地聚集为河流四周的风景。它就这样伴送河流穿过河谷。[29]可见,城市空间中的河堤、广场、桥梁、建筑、街道、园林、亭台等不仅具有生活实用功能,更是与自然生态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特定的生态审美符号,从而塑造主体的深层精神生态意识。索亚面对阿姆斯特丹“第三空间”的诗性沉浸式体验、凯文·林奇对城市建筑的“剧场式”审美意识等等,都凸显出城市特定空间的生态审美意义内涵,也表征出多元城市、“拼贴城市”等后现代生态城市实践的发展景观。

4.3. 城市空间交流实现生态正义的“整生”价值

后现代文化语境带来了新一轮的“空间压缩”“空间流动”景观,空间不仅仅局限在工业生产所营造的“核心”城市场域,而是体现出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星丛状城市之间以及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差异性”辩证融合,总体凸显出资本、信息、主体和空间不断流动的场景。曼纽尔·卡斯特以后现代网络社会的文化实践景观为基础,认为当代城市构成流动空间的一个个“节点”,总体上呈现出地方空间(spaces of places)的拓展与传播进程,并最终都纳入到全球化空间的网状结构之中。网络社会带来了新一轮主体、空间与信息交往模式的转型,推动后现代碎片化和个体化空间的重塑,并推动建构具有公共特质的空间形态,主体审美意识的虚拟呈现、地方生态景观的数字化交流以及网络赛博空间开放融合等形成了崭新的“另类空间”图景,推动生态正义价值的实现。“信息化城市并非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是流动空间的结构支配。[30]伴随生产、资本与主体的全球化流动,文化符号、生态审美、认同意识等也面临不断流动的场景。影像传媒的即时传播、生态景观的符号设计、身份场景的虚拟表达、主体交往的身份认同等等,这些都弥合了真实与虚拟、实在与想象的话语鸿沟,构建出后现代整体化的空间交往模式与审美体验模式。由此,后现代流动空间实现不同要素之间的“再整合”,建构出诸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领域空间形态,推动生态、审美、自然、城市、另类空间等要素的重新整合。这也契合了生态美学有机性、整体性、内在联系性等特质。后现代思维方式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概念基础之上的推重多元和和谐的整合性的思维方式[31],这其实已经内在融合了生态美学的“整生”的话语景观,呼应了中国古典美学“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自然生态中的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生成了具有生态整体观视野的“有机哲学”话语。可见,“整生”不仅塑造了主体精神生态的完满状态,丰富了生态美学的理论知识资源,更是凸显了整体化的哲学思维模式,显现了生态精神的本源性存在论价值。怀特海的哲学,尤其是其中的有机论自然观,

是一种意义深远的生态学,即在自然界诸种生命活动整体中为人类定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先驱。[32]

可见,城市的生态设计、生态建设、生态旅游等能够将另类空间的生态景观进行协调融合,形成主体活动与城市生态建设的平衡统一。比如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就实现了生物多样性、园林审美性、功能开放性与气候调节性等多重功能的综合,极大凸显了城市的生态审美景观。这正是借助主体与城市空间的流动性布局,凸显了城市生态建设的“整生”式目标。现代城市应该实现功能性、休闲式与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破除不同空间之间的区隔,形成整体化城市生态空间的建设机制。区域由节点组成,由边界限定范围,通过道路在其间穿行。[33]与此同时,城市古镇景观的审美体验与身份认同、特定建筑的场所意识、民俗风景的符号表达、地理文化的“深生态”旅游以及数字仿象的“超空间”传播等等,这些都营造出崭新的后现代审美共鸣景观,推动生态审美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给人们美的享受,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依托。[34]

城市生态问题伴随现代性工程出现,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失衡形成相互呼应、相互融合的内在关联,建构出从空间实践到精神空间、从自然环境生态到主体精神生态的理论线索。如果说空间正义与生态正义构成社会现实层面的实践策略;那么主体对城市自然空间的审美体验则构成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审美救赎的文化价值,从而弥合现代性之“隐忧”,重建主体、生态、空间与审美等要素之间的动态关联。主体面对城市生态“家园感”的身份认同、城市内部技术与自然相融合的审美体验、城市空间交流的“整生”面貌等等,这些都将城市生态的发展与主体内在精神的自由丰富进行结合,实现自然生态的审美意义释放。生态美学理念也通过城市公共艺术的符号表达、另类空间的传播共鸣等得以拓展,借助文学艺术审美的方式实现“深层生态学”的目标。审视未来,城市空间建设将在数字技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等文化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深入,推动不同主体形成崭新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实现主体精神生态的完满与自由。

基金项目

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技术现象学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感官生态变迁研究”(23YJAZH023); 2021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城市精神空间生态及美学重构路径研究”(21ZD123); 湖北科技学院创新团队项目“元宇宙及传媒发展研究”(2022T06)。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9页。

- [2]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3-274页。
- [3]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8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 [5]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 [6]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06-307页。
- [7]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0页。
-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 [9] 胡大平:《城市与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 [10]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97页。
- [11] 邓志文:《后现代图像景观中的超空间》,《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第23-32页。
-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2页。
- [13]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9-130页。
- [14]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6页。
- [15] 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王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 [16]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4页。
- [18] 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王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03-104页。
- [19] 马丁·杰:《阿多诺》,翟铁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 [20] 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第55-56页。
- [21] 曾繁仁:《再论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第122页。
- [22]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74页。

- [23]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3页.
- [24]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 [25]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1页.
- [26] 庄子:《庄子·逍遥游》,《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 [27] 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 [28] 菲利普·克莱顿:《从过程视野看作为后现代理论和实践的生态美学》,庄守平、程相占译,《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43页.
- [29] 海德格尔:《筑·居·思》,《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0页.
- [30]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1页.
- [31] 柯布、樊美筠:《现代经济理论的失败: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全球金融危机——柯布博士访谈录》,《文史哲》,2009年第2期,第11页.
- [32] 田中裕:《怀特海:有机哲学》,包国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 [33]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 [34] 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 (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74页.